

胡适传论

胡适

(京)新登字 002 号

本书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适传论/胡明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12 重印
ISBN 7-02-002273-1

I. 胡… II. 胡… III. 胡适—传记—中国 N.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7871 号

责任编辑:王培元

封面设计:柳泉

电脑制作:李新红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792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4.125 插页 5

199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3101—8100

定价 48.50 元



晚年的胡适

自序

做《胡适传论》这本书，实际上就是为胡适“画像”。胡适晚年说过一句后来证明是相当有自知之明的话：“我的相很难画”。为胡适“画像”注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胡适生前已经有人为他画过“像”，即为他写过“传”，如1941年12月胡不归（胡传楷）的《胡适之先生传》，但胡适很不满意。五十年代胡适在唐德刚帮助下也自画过“像”——他自己英文口述，唐德刚笔录整理。两人合作的结果即是后来相当出名的那一册“唐德刚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不过胡适生前并没有看到这册“口述自传”的出版，更没有读到唐德刚教授的“中译”和那么多精彩的“注”。事实上他对五十年代那一幅并非精心制作的“自画像”恐怕也并不满意，故在临死前的一个多月（1962年元旦）还深有感慨地对历史学家吴相湘说：“我的传记不知由谁来写？”

胡适逝世后，台湾的李敖先生就开始动手替胡适“画像”。他显然不满意台湾官方版的毛子水《胡适传》那样“简陋”谀墓式的传记，他要“自告奋勇地来做这件大工作”。他说：“我的目的不仅在‘画’胡适之的‘像’，并且还要画这个时代的像，我要画出这个时代里的大舞台，画出它的喜剧和悲剧，画出剧里的主角与配角，画出它的场地的布景，画出布景后面的众生相，也画出戏台前面的千万只眼睛。”这是他1964年2月24日——胡适死后二周年的那一天深夜发的愿。五年后，即胡适逝世七年后的1969年我才读到李敖的《胡适评传》第一册的香港版。我读了

这第一册，很过瘾，巴望着另外九册（李敖计划要写十册，一百二十万字的）问世。但是一直等到今天尚不见其第二册的出来，心里便很觉沮丧。今年已是胡适盖棺三十周年，真说得上是“墓木已拱”了。去年10月从香港开完了“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回来，我便觉得有必要自己动手试试为胡适画“像”了。

我替胡适“画像”，远没有李敖先生那样的大志，要画全胡适“像”背后的“时代”、“舞台”、“布景”、“众生相”、“千万只眼睛”等等。我只愿老老实实、清清楚楚地画完画好胡适他一个人的“像”。我觉得能画好胡适的“像”已经很可满足的了，不再奢望能附带画出其他什么来。从前胡适批评俞平伯的做新诗“太多哲理的咏叹”，曾说：“做一个好诗人已是尽够享的幸福了，不要得陇望蜀，妄想兼差做哲学家。”我也只把画好胡适一人的“像”当作“尽够享的幸福”。同时也立定主意将李敖先生找来的那句英国大政治家克伦威尔的名言“画我须是我”（Paint me as I am）作为准则或者说作为“警戒”。李敖先生亦有一句名言：“胡适之不是轻易被了解的人，所以他也不容易被论断。”我深信这一句话，故我在“画像”时十分小心谨慎，决不轻易说“了解”，决不轻易下“论断”。我下大气力只求画得像，画得准确，画出来的是真胡适，即画出胡适的真面目、真人格、真精神、真气象来。我力求客观。

所谓“客观”，便是老实实在地“纪实传真”。胡适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中曾说：“传记的最重要条件是纪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对于政治有忌讳，对于时人有忌讳，对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讳。圣人作史，尚且有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谬例，何况后代的谈墓小儒呢？……故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失于谀颂，便失于诋诬，

同为忌讳，同是不能纪实传信。”所谓“客观”，便是要去除这种种的“忌讳”，排斥“谀颂”或“诋诬”种种先验的主导精神，存一个“纪实传真”的负责态度。也即是如斯宾诺莎说的“不必赞许，不必惋惜，也不责难，但求了解认识而已”。一个严肃的史家的作品必定要“使人感觉历史的真实，使人从他的书里可以想象往事与古人的实在状态”。这是胡适在《〈西洋现代史〉序》里说过的话。

为了“纪实传真”、“纪实传信”，为了留下胡适一生的“实在状态”或者说“历史的真实”，我本着近世“实录派”史学的学术原则，在史料处理上让胡适自己多说话，说连贯的话，说完整的话，并清晰地显现胡适说话时的情境、场景及对应的听者或读者，上下开合照应，前后左右贯通。就是说既然是为胡适“画像”或“立传”，这本书上、这幅画布上即这个舞台上基本让胡适自己来充分表演：唱的唱辞、念的念白、翻的筋头、走的边、圆的场、扎的靠、亮的相，画的脸谱、报的家门，吟的定场诗……都尽量由胡适自己在台上完成。我只须编排出“传”的纲目，并就每个纲目的历史程序和事实环节推送出、导引出“论”——历史理解与文化评估。我的“论”建筑在胡适的“传”——他在前台每一场每一幕的真实表演——的基础之上。我不多说话，只是替胡适说的话、胡适的台词与表演编程序，整理成有机线索，贯串成生命图象。我是宾，胡适是主，我决不喧宾夺主，替胡适乱说话，乱表态，乱定性，乱下结论。——胡适的戏自己演完了，话说完了，表态完了，他的历史结论也出来了，他的是非定性也清楚了。

有人会问：你的“传论”与目下通行的“评传”有什么不同？“评传”是以“评”为主导的“传”，形制是“传”，但作者的“评”在精神意识上笼罩了传主的“传”。“传论”则是以“传”为纲目的“论”，形制是“论”，但传主的自填履历、传主的充分表演、传主的

自我“鉴定”与自我“批评”在内容形态上规范了我的“论”。换句话说，我的“论”的依据与例证主要是用传主即胡适自己的思想言论编排整合的，我一般不作有“强行”嫌疑的切割、阻断、拆补和藏匿。一切都是自然流出的，水到渠成，因此在源流上还是属于“以史带论”的一脉的。

本书的工作重心是整理或者说清理有关胡适生平与思想的史料，而不是解释和分析史料。近十几年来有关胡适的研究著述往往表现出“整理”不足、“解释”有余的倾向，解释过于绵密，过于繁琐，过于武断，过于我执，从“以论带史”到“两分法”的评价鉴定，“解释”史料的一头既兴旺发达又仓促草率。兴旺发达的表现是“假、大、空”，仓促草率的表现是“短、平、快”。它们的常规表现是抓往胡适的片言只语发议论，作鉴定，论“文”不看“全文”，论“人”不顾“全人”。其操作稔熟者则掐断一段，品评一段，深文周纳，拿出一个结论。甚至胡适的唱段刚吐出二三个词就喝断，就省略掉后文，指说腔正如何，调圆如何，属于某派，韵味醇驳等等。这显然不是历史学者应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的研究与评审非但胡适泉下不服，对读者、对观众也大有愚弄欺骗之嫌。以上是我为什么“画像”以及怎样“画像”的一点自供状，实际上亦是解释了自己撰写这本书的一条服膺的准则。

下面便来谈谈我对画像上的人——胡适——的认识基点。这个认识基点便是本书研究思路的经纬，或者说思维结构的支柱，造型色彩的主调。

胡适多姿多彩的一生似乎正是现代中国历史舞台多姿多彩的一个缩影。从“文化”和“史”的角度来看，“现代中国”的序幕或便是胡适拉开的。1917年发轫的新文化运动（胡适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是“现代中国”文化结构全面更新的肇始，在这场绚烂壮丽的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既是首举义旗、冲锋

陷阵的“急先锋”，又是登坛点将、呼风唤雨的摇鹅毛扇式的人物。中国的旧学术文化经过了这个运动的淘洗，出现了一个性质突变的新“范式”。胡适在文学、伦理、教育、思想、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全部革新意义便在革“新”了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旧文化范式及其严密完整的价值体系，领导一代知识精英与前进的思想界跨入了一个新的文化时代，导致了那个时代全套的信仰、价值、观念、标准、规范、通则以及思维习惯与文化技术上的改变。质而言之，胡适把中国思想文化从旧的变成了新的、古典的变成了现代的，从而为“现代中国”登上历史舞台作了观念形态上的准备，也即是在思想文化上为“现代中国”催生。

同时，胡适的文章、著作、演讲、教学也全都是有目的、有意识地围绕着这一份转换“范式”的开创性的工作。他的坚持科学宇宙观与人生观，终身服膺无神论，鼓吹个性解放，宣传婚姻自由，提高妇女地位，抨击封建礼教，反对祭孔读经，推行教育改革，主张民主人权，努力社会改良，提倡节制生育等等，无一例外地都可看作是他为建立新的文化“范式”所作的主观努力。新文化“范式”迅速有力地动摇了三千年来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煽起了思想启蒙的狂飙，直接影响了时代精神和民族灵魂的觉醒。胡适在他所涉猎的各人文科学学科都沉潜下来做过一番研究探索的工作，写出一批有很高学术造诣的专著与文章，在诸多学科都作出了开风气的重大贡献。他还切切实实，有奖掖、有批评、有目的、有方法、有说服力与感化力地引导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走上纯粹的学术研究之路，桃李满天下。

作为旧时代的最后一位送葬者与新时代的最初一位先知，胡适注定要被新旧两个时代的人误解与曲解。盖棺三十年来，关于他思想与地位的争执不绝于耳，事实上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七十年里对他思想文化业绩的评价和人生道路选择的是非一直

存在着歧见。最近的四十多年里他几度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注意的焦点，甚至不约而同地沦为海峡两岸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思想资源与理论武库而受到批评。胡适的历史评价纷乱复杂的同时，他的学术文化上的建树与品位也被团团浓云笼罩，摆脱不了人为的政治纠纷，留下生前厮缠时的伤痕和死后评价上的误区。

胡适在同时代人的误解与曲解中走完了一生，胡适生前从来没有对这些误解、曲解作过一点辩白与校正。他是典型的灵魂孤独者，与他生活着的那个世界存在着深峻的隔膜，他有时还怀疑是处在两个不同的生存平面和文化坐标。心曲难诉或者说又加上金针难传，他迫不及待地用最浅近易懂的语言把自己推向外部世界，找朋友，诉衷曲，努力让人理解。然而，胡适他独特的人生经验和思想旅程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对人的理解与要求、对世界的评价与把握、对未来的设计与追求，使他很难找到真正的知音和合格的学生。他渴望入世，渴望对话，渴望开诚布公、肝胆相照，渴望人人选择他指示的人生方向与文化前程。不幸的是，他的这些企图在几代人身上都落空了，他是怀着深深的失望离开人世的。他活着的年代，“天下何人不识君？”但真正“识”了的，又真有几儿？尽管胡适的思想本身是明白易懂的，她的力度、丰富、深邃使她有非凡的雄辩性与说服力，但一切似乎都无济于事，一切都被习以为常的误解与曲解消解了，剩下的不是偶象的经验化，便是概念的漫画化。面容苍白、心灵瘦弱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竟承受不了认识胡适的思想压力与认同胡适的历史压力。胡适的命运是一面镜子，有其独特的启示意义。胡适的生命史存录的一堆信息符号，我们今天正需要细心的解读与破译。

1954年9月胡适曾为宋人范仲淹的《灵乌赋》写了一篇发

挥对象人格化的读书笔记，他击节叹赏“灵乌、灵乌，尔之为禽兮何不高飞而远翥？何为号呼于人兮告吉凶而逢怒！方将折尔翅而烹而躯，徒悔焉而无路”。这样的哀悯辞句与他三十七年前的《老鸦》诗含义却是同样的。胡适更多的是把自己比喻成一羽告人吉凶而遭人嫌厌的“老鸦”，终不肯“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天寒风紧，无枝可栖”，胡适一生都感觉到自己的孤凄与寒凉，在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态林里竟找不到可以栖息的一枝！但他又终不肯放弃自己号呼而鸣的天赋职责，终不肯放弃“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生命信条和“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浩然心志！

胡适曾被称颂为“圣人”、“当今孔子”；也曾被诋斥为“国贼”、“人民公敌”。其实，公正地说，他并不是“神”，更不是“鬼”，他是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有感情有理性，有欢乐亦有痛苦，有优点亦有弱点，有一贯亦有矛盾，有“不可救药”的乐观，亦有“低头叹气”的悲观，有纯粹的至性、极高的修养，亦有血气冲动之时、沉溺忘返之际。他反对将“弟兄”之天伦引入“朋友”之人伦，反对朋友间称兄道弟，但他写信给朋友还是某兄某兄地称呼，在“中研院”院长任上时更还将院长给院士冷冰冰的公函一律改为自己签名的某兄某兄的人情味称呼。他反对打麻将，还专门写过《麻将》一文加以痛斥，但他自己偶尔也打麻将，逢年逢节逢生辰寿诞家里还摆起四五桌。他坚信科学，饱受科学文明洗礼，但也不算过命。他反对暴力恐怖，但忿激之时也呼唤过“炸弹！炸弹！”“干！干！干！”他反对政治革命，但也呐喊过“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他明白批判东方文化，也说出过赞同“全盘西化”的话，但他最爱钻的还是国学故纸堆，最爱干的还是“倒中国字纸篓”，等等等等。这都说明他是个懂得喜怒哀乐的活生生的人，不是“木头牌位”，不是供奉在神厨里的满头光圈的偶像！我今日要抬出来的便是这样一个“全人”，一个“原生态”的胡适

——用胡适自己作模特儿的“画像”。我写这本书是用“胡适是这样一个人”回答了“胡适是怎样一个人”的历史问号。我自信，读了这本书，一个活的胡适已呼之欲出。

胡适曾有一首极为重要的诗，题为《回向》，常常被人忽略。
诗云：

他从大风雨里过来，
爬向最高峰上去了。
山上只有和平，只有美；
没有风和雨了。

他回头望着山脚下，
想起了风雨中的同伴，
在那密云遮着的村子里，
忍受那风雨中的沉暗。

他舍不得他们，
但他又怕那山下的风雨。
“也许还下雹呢？”
他在山上自言自语。

他终于下山来了，
向着那密云遮处走。
“管他下雨下雹！
他们受得，我也能受！”

—— 1922年10月19日

胡适自己注释说：“‘回向’是《华严经》里一个重要观念。”他自称：“我的诗是用世间法的话来述这一种超世间法的宏愿”。这里的“述”便是“宣示”，宣示他所理解的生命真谛或者说人生的选择。——从这个“关捩子”上来看胡适的生平与思想，或许正是所谓“正法眼”。

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目 录

自序	1
第一章 序篇	1
一 胡适的先世	1
二 胡适的故乡	8
三 胡适的父亲	21
四 胡适的母亲	38
五 胡适的大家族	48
六 胡适的小家庭	58
第二章 故乡九年	81
七 从台湾回绩溪	81
八 私塾与启蒙	87
九 读小说到讲故事	96
十 无神论的结胎	103
十一 风雨如晦中的寡母幼子	114
十二 出门	123
第三章 上海滩新少年	129
十三 从“梅溪”到“澄衷”	129
十四 时代潮流的涟漪	137
十五 《竞业旬报》——思想之胚芽、文笔之摇篮	152
十六 少年诗人	177
十七 中国公学之风潮	195

十八	考官费留美前后	203
第四章	青年时代——留美七年	218
十九	踏上异国——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沐浴	218
二十	人文科学的选择到淑世主义的确立	230
二十一	学问之路——贯通中西,融会古今	245
二十二	政治的兴趣与美式政治的训练	261
二十三	胡适思想奠基	281
二十四	博士与事业	302
第五章	新文化的火炬	322
二十五	文学革命的号角——首举义旗	322
二十六	蔡元培、陈独秀的圈子——北京大学与 《新青年》	343
二十七	“我的儿子”与“我的宗教”	367
二十八	《每周评论》与“问题”“主义”	387
二十九	“哲学史”开山和“新思潮”开路	415
三十	“新诗老祖宗”	433
第六章	中国现代学术的新盟主	461
三十一	新红学的日出	461
三十二	整理国故,捉妖打鬼	488
三十三	科学人生观与“胡适新十诫”	507
三十四	新教育的催生婆和护法神	525
三十五	摆渡西洋近代文明的舵手	546
三十六	一个新孔子	566
第七章	政治妊娠的胎动与流产	591
三十七	好人政治与好人政府	591
三十八	清廷问题与善后会议	611
三十九	与国共两党的政治冲突	626
四十	西游与东望——苏美两块样板之间	647
四十一	《新月》的光和“人权”的火	665

四十二	落花流水辞江南	686
第八章	独立的旗帜	706
四十三	《独立评论》	706
四十四	“民治”与“独裁”的讨论	726
四十五	“民权保障同盟”的风波	747
四十六	南游	761
四十七	日本人问题	779
四十八	“三代遗风”到一二九运动	799
第九章	“小卒过河”	817
四十九	从低调抗日到奔赴国难	817
五十	驻美大使	835
五十一	卸任之后	860
五十二	北京大学校长	879
五十三	“小卒”沉底	902
五十四	仓皇出逃	924
第十章	海外的日子	944
五十五	纽约寓公	944
五十六	大陆批判胡适思想	963
五十七	台湾围剿胡适幽灵	989
五十八	“中央研究院”院长	1009
五十九	雷震事件冲击波	1026
六十	巨星陨落	1051
附录	专家推荐意见二则	1077

第一章 序 篇

一 胡适的先世

胡适的先世称“上川明经胡氏”，“上川”即徽州绩溪县之上庄，“明经胡氏”则别于绩溪县其他胡氏宗族——所谓“绩溪诸胡”。“绩溪诸胡”中最有名气的便是世居绩溪县城华阳镇的“金紫胡”，也即是以胡匡衷、胡培（翬、胡秉虔等先贤为代表人物的经学或礼学的书香望族，其上世可追溯到十一世纪《苕溪渔隐丛话》的作者胡仔。胡适成名后便有人将他与这个大有名气的汉学书香望族在血缘上联缀了起来，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写的“序”中称“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在《答林琴南君函》中又说：“胡君（适之）家世汉学”。胡适在他的《口述自传》中曾特地指出更正：“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为拙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卷所写的序言中，曾误把我家说成是世居绩溪城内胡氏的同宗。蔡先生指出绩溪胡氏是有家学渊源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纪之间满清乾嘉之际，学者如胡培翬（1782—1849）及其先人们都是知名的学者……但是这个世居绩溪城内的胡家与我家并非同宗。”又老实承认：“我家世代乡居……历代都是靠小本经营为生的。”另一位弄错胡适家世的著名人物是梁启超，他在1924年2月写的《清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安徽”一节中称胡匡衷、胡培翬、胡承珙为“绩溪三胡”，又说：“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

胡适之(适)云”。又《清代学术概论》中称：“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他也将胡适与“绩溪诸胡”挂起钩来，且言之凿凿：“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胡适不是“绩溪三胡”之后，他家祖上压根儿与汉学没有一丝联系。他家祖上是农民，近世乃小本经商，识字的便不多，更说不上“多才”了。胡适父亲胡传是服膺宋学的一个秀才，后来虽也做了州县级的地方官，但声名不出乡里本族，在绩溪一县的名人录里是微不足道的，尽管其学问识见、行为胆略大可称道。也许由于蔡元培、梁启超等人的影响，后面跟着错的人似不少，如杨家骆《新世纪高中国文选》称：“适之为绩溪汉学家胡培翬之后，故云家世汉学。”传到日本，竟径直变为“胡培翬的儿子”了，如日本诸桥辙次编的《大汉和辞典》中“胡适”条目下明白写着“安徽绩溪人，胡培翬之子”。而胡适的父亲称胡培翬则为“吾邑胡竹村先生”！近二十多年来胡适与“绩溪诸胡”的纠葛已被澄清，但对胡适先世的考述则大多语焉不详，故笔者费点笔墨先做一番叙述。

胡适先世的“明经胡氏”不是一般意义的区分“绩溪诸胡”，这个氏族对自己先祖胤脉极其看重，怀有一种独特的感情认知，所谓“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家，未尝散处；千载之谱，丝毫不紊”。他们到今天仍聚族而居，上庄几乎是清一色的“胡”姓，巍峨壮观的宗祠虽然毁于“文革”，但村里族中敦伦叙礼、长幼有序的遗风仍很浓厚。宣统三年编定的最后版本的“上川明经胡氏”的族谱，卷帙俨然，形同一部廿四史。最早将“上川明经胡氏”的先世公诸于世的是《新月》社友潘光旦，他在1931年出版的《新月》月刊第3卷第5、第6号上写了一篇《一本有趣的年谱》的文章——他读了胡适父亲胡传(钝夫)自撰的《年谱》后的介绍文字。文中有一段话涉及“明经胡氏”的先祖：